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文与社会译丛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扭曲的人性之材

Isaiah Berlin

[英]以赛亚·伯林 著 岳秀坤 译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扭曲的人性之材

[英] 以赛亚·伯林 著 岳秀坤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扭曲的人性之材／(英)伯林(Berlin, I.)著;岳秀坤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1
(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ISBN 978-7-5447-0755-8

I. 扭… II. ①伯… ②岳… III. 自由-研究 IV. D0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3007号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by Isaiah Berlin & Henry Hardy
Copyright © 1959, 1972, 1975, 1978, 1980, 1983, 1988, 1990 by Isaiah Berlin
This selection and editorial matter © 1990 by Henry Hard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Group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5-227号

书 名	扭曲的人性之材
作 者	[英国]以赛亚·伯林
译 者	岳秀坤
责任编辑	黄 颖
原文出版	John Murray, 1990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47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 www. yilin. 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 www. ppm. cn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375
插 页	2
字 数	211 千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755-8
定 价	22.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主 编 的 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

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作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Aus so krummem Holze, als woraus der Mensch gemacht ist, kann nichts ganz Gerades gezimmert werden.)

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1784

目 录

编者前言	001
一 理想的追求	005
二 乌托邦观念在西方的衰落	024
三 维柯与文化史	051
四 18 世纪欧洲思想中所谓的相对主义	072
五 迈斯特与法西斯主义的起源	094
六 欧洲的统一及其变迁	178
七 浪漫意志的神化:反抗理想世界的神话	209
八 压弯的树枝:论民族主义的兴起	241
索 引	265

编者前言

本书实际上是接续四卷本伯林《选集》(*Selected Writings*)的第五卷,尽管它版本不同,印制形式也自成一体。大约十年前,我曾把以赛亚·伯林已发表过,但迄今未集中刊布的绝大部分论文收集成书,这套书共含四卷,总题为《选集》。^①伯林的许多论文散见各处,一般不易见到,而且多数已经绝版,此前收集并重新刊布的论文仅有六篇。^②这四卷著作,以及其中一卷(《反潮流》)所附的伯林著述目录,使读者得见的伯林论著比以前多了许多。

这本新书跟《反潮流》一样,也是关于观念史研究的。其中包括伯林早期写作的一篇未刊论文,三篇作于其最后十年间的论文,以及四篇因

① 《俄国思想家》(*Russian Thinkers*, London and New York, 1978),《概念和范畴:哲学论文集》(*Concepts and Categories: Philosophical Essays*, London, 1978; New York, 1979),《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Against the Curren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1979; New York, 1980),《个人印象》(*Personal Impressions*, London, 1980; New York, 1981)。

② 见《自由四论》(*Four Essays on Liberty*, London and New York, 1969)以及《维柯与赫尔德:观念史研究二题》(*Vico and Herder: Two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and New York, 1976)。其他纂集仅见于译本。

故未收入《反潮流》的论文。我在《反潮流》一书的前言中已对个中缘由有所交待。很高兴这四篇论文中的三篇在原发表杂志的重刊合订本中已经可以见到；而第四篇“压弯的树枝”，因为与《反潮流》中的另一篇同一主题（即民族主义）的论文较为相似而被省略掉，但无论如何，其中还是有許多独特的内容，因而在这本文集中，它得到了充分的重视。

讨论约瑟夫·德·迈斯特的一篇论文，在本书中是首次发表。伯林认为此文还需要进一步的修改，因而在1960年暂时将其搁置了。不过，这篇文章已经非常接近发表的水平，而且价值相当高，收入本书应该是合理的。尽管伯林后来补充了几个新的段落，还重写了几段，但在充分考虑此后有关迈斯特的研究的基础上，他也并没有对此文进行系统的修改，无论如何这并没有影响到它的核心论题。

有关重印论文的详细情况如下：

“理想的追求”，是伯林1988年2月15日在都灵的庆祝会上所发表的简缩版，当时，他荣获首次为“发达社会的伦理维度”而设的乔瓦尼·阿涅利议员国际奖，后由阿涅利基金会出版（英文与意大利文），同时也刊登在1988年3月17日的《纽约书评》上。

“乌托邦观念在西方的衰落”，1978年由日本基金会在东京出版，后又收入J. M. 波特和理查德·弗农编辑的《一元、多元与政治：纪念F. M. 伯奈德论文集》^①。

“维柯与文化史”，发表于利·考曼等人编辑的《有多少问题？——纪念悉尼·摩根贝沙论文集》^②。

“18世纪欧洲思想中所谓的相对主义”，最初发表于《18世纪不列颠研究》杂志1980年第3期，修订版收入彭帕与德雷编辑的《历史中的

① J.M.Porter and Richard Vernon eds., *Unity, Plurality and Politics: Essays in Honour of F.M.Barnard*. London and Sydney, 1986, Croom Helm.

② L. Cauman, Parsons and R. Schwartz eds., *How Many Questions? Essays in Honor of Sidney Morgenbesser*. Indianapolis, 1983, Hackett.

实质和形式:历史哲学论文集》^①。

“欧洲的统一及其变迁”,是1959年11月21日伯林在欧洲文化基金会于维也纳召开的第三届年会上的演说词,同年由该基金会于阿姆斯特丹出版。

“浪漫意志的神化:反抗理想世界的神话”,该文的意大利语译文于1975年刊登在《意大利文学》(*Lettere italiane*)第二十七卷上,本书首次发表其最初的英文本。

“压弯的树枝:论民族主义的兴起”,发表于1972年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第51期上。

因为是在不同的讨论背景下探讨相同或相近的主题,这些论文中有些讨论像四卷本《选集》一样,不可避免地有一定程度的重叠。每一篇论文写作时都是完全独立的,并没有做承前启后的考虑。除了必要的纠错以外,以前刊发过的这些文章基本上均保持原貌,并没有附录参考文献(这里尤需指出,讨论相对主义的文章参照了最初的版本,并补充了几处遗漏)。

本书的标题源出康德,伯林常爱引用此引语的英译文:“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②伯林总是将此语的翻译归于柯林伍德,但实际上他并未原封不动地照搬柯林伍德的译法。这一引文并非出自柯林伍德的已刊著作,而见于其未刊手稿,时间标为1929年,是一份关于历史哲学的讲演稿,译文如下:“人性之木纹理交错,从中造不出

① L.Pompa and W.H.Dray eds., *Substance and Form in History: A Collection of Essays in Philosophy of History*. Edinburgh, 1981,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Press.

② “Out of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no straight thing was ever made.”此语的德文原文以及另一种更为文学化的翻译,均见本书正文之前的题记。

笔直的东西。”^①伯林很可能听过这次演讲,而且对这段话印象很深,后来便在他的记忆之中蕴育成熟了。

编辑此书时,我再次得到了众多学者的热情襄助。如 Roger Hausheer 先生,如果没有他的建议,讨论迈斯特的论文就有可能失收;在其他方面,他也给予了许多支持,恕不一一列举。有几处隐晦的疑难问题,我或许要费时甚久,还有可能徒劳无功,而 Leofranc Holford Strevens 先生为我提供了直截了当的答案。Richard Lebrun 凭借他有关迈斯特的专业知识储备,给了我无比慷慨和高效的帮助。有关赫尔德和洛克, Frederick Barnard 先生给予的帮助最多。其他个别问题的解决,我还要感谢 John Batchelor, Clifford Geertz, David Klinck, Jean O'Grady, John M. Robson, Cedric Watts。我的妻子安妮细心地核查了两遍校样。伯林的秘书 Pat Utechin,一如既往地提供了慷慨大方、不可或缺的支持和帮助。

亨利·哈代

1990年5月

① 英文为:“Out of the cross-grained timber of human nature nothing quite straight can be made.”应该指出一点,柯林伍德最初并没有使用“crooked”,而是后来才添上的(现在仍然可以看出来),以取代“cross-grained”一词。这一改动可能是在作了演讲之后;或者,同一段落也许在没有保存下来的另一次演讲中以另一种面目出现过。真相有可能难以再弄清了。我很想向杜森(W. J. van der Dussen)先生表示感谢,是他向我指出了柯林伍德手稿中的正确位置,还要感谢特莉莎·史密斯,柯林伍德的女儿,也是其著作的继承人,允许我引用此语。柯林伍德的手稿现存博德莱安(Bodleian)图书馆,上述演讲稿标记为“II(T.T.1929)”,在第十二盒中(shelfmark Ms. Collingwood 12),该引语出现在编号第三页。

理想的追求

1

在我看来,对 20 世纪的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因素有两个。其一是 1
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这显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辉煌的丰功伟业,各
方面已经给予它非常多的关注。另一个因素毫无疑问,就是改变了全人
类生活的意识形态大潮——俄国革命及其后果,其中包括了极左与极
右的极权主义专制,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及(在某些地方的)宗教偏执
狂的爆发,而耐人寻味的是,那些 19 世纪最敏锐的社会思想家们,却无
一人曾对此有所预见。

两三百年以后,如果人类那时候还存在的话,我们的后代回过头来
看这个时代,我想正是这两种现象将会被他们看成是 20 世纪的突出特
征,最有解释和分析的必要。然而也应该知道,这些波澜壮阔的运动其
实都是肇始于人们头脑中的某些观念,亦即人与人之间曾经是、现在
是、可能是以及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同时还应该知道,在领袖们——尤
其是那些身后有一大群军队的先知——头脑中某些最高目标的名义

- 下,这些关系是如何被改变的。这些观念正是伦理学的要义。伦理学思想就是要系统地检讨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人类对待别人的行为方式由以产生的概念、利益和观念,以及种种人生目的所由以建基的价值体系。生命应该如何度过,男人与女人应该是什么,应该做什么,此类信念是道德研究的对象;而一旦问题转到群体和种族——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则称之为政治哲学,也就是应用于社会的伦理学。

假如我们希望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经常是充满暴力的世界(除非我们试图去弄懂它,否则我们就别指望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理性地行动),就不能仅仅关注影响我们的那些自然的和人为的非个人性的巨大力量。引导人们行动的目的和动机,才是应该根据我们认识和理解的一切来观察的;有关它们的根源和发展,它们的本质,以及最重要的,它们的有效性,都应该调动我们所有的理智资源,对其加以批判的检讨。除了揭示人类彼此关系之真理的内在价值之外,上述这一紧迫的要求也使得伦理学成为具有头等重要性的领域。只有那些未开化的野蛮人才会不关心这样一些问题:他们来自何方,如何来到这儿,又将去向何方,以及他们是否愿意这样走下去,如果愿意的话,原因何在,如果不愿意,又是何种理由?

关于体现这些价值和目的的生活观,有种种不同的理念,而研究这些理念正是我耗费我人生长长的四十年光阴,想要弄明白的事情。我很愿意谈一谈我是怎样被这一题目吸引住的,尤其是改变我关于伦理学核心之认识的转折点。如此一来,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带一点儿自传性质——对此我要表示歉意,但是只有这样我才能谈下去。

2

年轻的时候我读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只是到后来,这部名著才对我产生真正的影响,同时影响我的

还有 19 世纪中其他俄罗斯作者的作品,其中既有小说家,也有社会思想家。我的观点的形成跟这些作者有很大关系。我过去认为——现在还这么想——这些作者的目的从根本上讲,或许并不是对个人、社会团体或阶级相互之间的生活和关系给予客观如实的描述,也不是对它们进行心理学或社会学的分析——当然,他们之中的佼佼者的确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不具有可比性。依我看,他们的方法在本质上是道德的:他们关注最多的是不公正,压迫,人与人之间荒谬的关系,以及壁垒或陈规的禁锢(亦即屈从于人造的枷锁),还有愚昧、自私、残暴、屈辱、奴性、贫困、无助、仇恨、绝望,诸如此类——这些到底是谁的责任?简言之,他们关心的是这些人类经验的本质以及它们在人类境况中的根源;不过,其中隐含的首先是俄罗斯的人类境况。而且反过来,他们也希望知道,如何才能实现相反的一面,那将是真理、爱心、诚实、公正、安全的国度,人类的自尊、庄严、独立、自由以及精神圆满都得以实现,人与人的关系以此为基础而建立。

有些人,像托尔斯泰,在纯朴的人那未被文明腐蚀的观念中找到了答案;又如卢梭,他更愿意相信农民的道德世界和儿童没什么两样,没有被文明的传统和制度所扭曲,而后者则是人类罪恶——贪婪、自私、精神愚昧的产物;相信只有人们看到了真理就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世界才有可能得到拯救;如果他们还没有发现,那么真理就是在耶稣的福音——“登山宝训”^①里。在这些俄罗斯思想家中,也有人科学的理性主义抱有信心,或者是寄希望于以一种有关历史变化的真实理论为基础的社会和政治的革命运动。其他人或者回到东正教理论中寻找答案,或者是转向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又或者回归于曾经被彼得大帝及其后继者的改革所遮蔽的古代的斯拉夫价值观。

^① “登山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指耶稣在山上对其门徒的训示,内容系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译注

- 4 所有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相信解答核心问题的答案是存在的，并且可以发现，进而可以凭借大量无私的努力，在现世中使它成为现实。他们全都相信人类之本质就在于能够选择如何生存：只要对那些真实的理念有足够的热情和奉献精神，就可能依此来改变社会。即便有些人（像托尔斯泰）有时也会考虑到，人并非真正自由，而是受他无法控制的因素所决定的，但他们更加深信的是（托尔斯泰正是如此）：假如自由只是一种幻觉，它也是人类的生存与思考必不可少的一种幻觉。以上这些都不属于学校教育的内容——学校教的是希腊和拉丁语的著作家，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

进牛津大学读书之后，我开始阅读大哲学家们的著作，并且发现一些大人物（尤其是在伦理和政治思想领域）也持有我上面所说的想法。苏格拉底认为，如果可以用理性的方法在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中建立确定性的话（月亮要比伯罗奔尼撒半岛大好多倍，但是它在天上看起来多么小啊！——阿那克萨哥拉^①不就已经发现了这样的真理吗？），同样的方法在人类的行为领域——如何生活，成为什么——肯定也会产生同样的确定性。这一点可以通过理性的论证得到证明。柏拉图认为，把握了这种确定性的精英们（an élite of sages）应该被授予统治那些在理智方面天赋较弱的人的权力，并且，行事应遵照解决个人和社会问题的正确方式所规定的模式。斯多葛派认为，依据理性来安排自己生活的任何人都有能力找到解决的办法。犹太教徒、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我对佛教知之甚少）则相信，真正的答案是由神向他的选定的先知和圣徒昭示的，而且他们接受有资格的导师对这些被昭示的真理所做的解释，并认同他们所归属的传统。

在 17 世纪的理性主义者看来，答案是可以找到的，只是要借助一

^① 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古希腊哲学家，发现日月蚀的真正原因，著作《论自然》仅存片断。——译注

种形而上的洞见——这是所有人都赋有的理性之光的一种特殊的应用。而 18 世纪的经验主义者,则对以数学方法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所开 5
启的广阔的新知识领域印象深刻,它清除了众多的错误、迷信和教条的妄语;而且,他们像苏格拉底一样问自己,为什么同样的方法不可以在人类事务的领域中成功地建立相似的不可辩驳的法则呢?运用自然科学发现的新方法,同样可以在社会领域中引进秩序:发现一致性,提出假设并且通过实验来检验;以此为基础建立法则,进而可以发现特殊经验领域的法则是和更广范围的法则相联系的;而后者又和更广一层的法则相关,如此外推,直到建立一个巨大的和谐的系统,它由不可辩驳的逻辑关系联结,并且可以用精确的——也就是数学的——术语系统地阐述。

将社会加以理性的重组,就可以消弭精神的、心智的迷误,摆脱偏见和虚妄的控制,不再盲从未加验证的教条,并将终结压迫人之体制的愚蠢、残暴,从而,也就终结了这些心智阴影之所以孕育和滋生的温床。实现此目的,所需要的是:明确界定人类的根本需求,并且找出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如此,将会创造出一个快乐、自由、公正、美善、和谐的世界,这也是 1794 年孔多塞在牢狱之中激动地预言的世界。这种观念,是 19 世纪所有进步思想的根基;同时,当我在牛津求学时,多数批判的经验主义思想的核心也是如此。

3

在某一时刻,我意识到,所有这些观念的共同之处是一个柏拉图式的理念:首先,像在科学中一样,所有真正的问题都应该有且只有一个真正的答案,而其他的答案都必然是错误的;其次,必定有一条可靠的途径导向这些真理的发现;第三,真正的答案,如果找到了话,必定彼此融 6

洽、俱成一体,因为真理不可能是相互矛盾的——这一点是我们先验地(apriori)知道的。这种无所不包的理念才是对宇宙的七巧板式谜题的解决之道。至于伦理道德方面,那时我们会发现,完美的生活必定是,而且应该是,建立在对于统治宇宙之法则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的。

我们或许永远达不到真理这种完美的认识状态:也许是因为我们智力愚钝、过于低能、腐化堕落,或者是罪孽深重而无法把握它。可能有太多的障碍,无论是智识精神,还是外部物质方面。此外,像我前面说过的,应该循着哪条道路去追索,也是意见纷纭:有人去教堂里寻找,有人却埋头于实验室;有人相信直觉,有人依靠实验,有人仰赖神秘的幻想,有人则坚信数学的计算。不过,这些真正的答案,或者是一个最终的体系(所有真正的答案是交织在一起的),即便我们自己不能发现它们,它们也必定存在——除非问题不是真正的问题。必定会有某人能够知道真正的答案:也许是天堂里的亚当;也许我们只有等到世界末日才会知道。如果我们人类不能知道,那么也许天使会知道;如果不是天使,上帝总会知道的。这些永恒的真理,从原则上说,一定是可知的。

有些 19 世纪的思想家,像黑格尔和马克思就认为,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并没有永恒的真理,有的只是历史的发展,连续的变化;在进化的阶梯上,每迈出新的一步,人类的视域都会改变;历史是一个多幕剧,它在观念领域或现实领域中的力量冲突的推动之下前进,有时称之为辩证地前进,其表现形式是战争和革命,是国家、阶级、文化或运动潮流的暴力颠覆。然而,在经过了不可避免的挫折、失败、旧病复发,甚至是回归野蛮之后,孔多塞的梦想终将会化为现实。这一大戏将会圆满收尾——此前,人的理性已经取得了很多胜利,而且,它永远不会被阻挡。人类不再是自然的牺牲品,也不再是自己那些很大程度上不合理性的社会的牺牲品:理性终将胜利;普遍的和諧终将实现;真正的历史终将开始。

若非如此,“进步”观念,“历史”观念,还有什么意义呢?从无知到有